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朱鸣 著

体系变革与欧洲安全一体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博士文库

朱鸣 著

体系变革与欧洲安全一体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体系变革与欧洲安全一体化/朱鸣著.—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ISBN 978-7-208-14631-0

I. ①体… II. ①朱… III. ①欧洲一体化-研究

IV. ①D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6987 号

责任编辑 王 冲

体系变革与欧洲安全一体化

朱鸣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6 插页 5 字数 207,000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631-0/D·3060

定价 48.00 元

体系变革与欧洲安全一体化



序

安全一直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个核心关切。欧洲煤钢联营计划,即“舒曼计划”,作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奠基石,并不仅仅以单纯的贸易甚至经济因素为唯一目标,而是从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政治和安全意图。毕竟,煤和钢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直接事关国家战争能力的。就像时任法国外交部长舒曼本人所解释的,欧洲国家要实现一体化,必须结束长达百年之久的法德冲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法德的全部煤钢生产置于一个高级联营机构的管制之下,并让其他欧洲国家参加进来。这样,法德之间发生战争的物质基础就不存在了,欧洲地区便可以摆脱战争策源地和战争牺牲品的历史命运。可以说,很多欧洲国家把发展地区主义看作解决国家安全忧虑的重要渠道。

然而,对国家安全的先天之忧同时又是欧洲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障碍。经济一体化进程似乎总是摆脱不了国家安全的纠缠。欧洲人所期盼的地区安全合作并没有如期而至。尽管欧共体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持续寻求地区安全合作,但作为安全合作制度化形式的安全一体化水平却一直很低。在冷战前半期,从“欧洲防务共同体”、“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失败到“富歇计划”的流产,欧洲安全一体化进程频频受挫。到了冷战后半期,欧洲安全一体化进程才以“欧洲政治合作”机制的形式得以启动,并取得了重要但却非常有限的进展。冷战结束以后,欧洲安全一体化进程才以“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共同安全与防

务政策”等支柱的先后建立为标志取得了快速发展。问题在于，为什么欧洲安全一体化在面对苏联威胁和获得美国安全保证的冷战期间，不是频频受挫就是发展缓慢，相反，在冷战结束后，在苏联威胁消退和美国安全保证下降的情况下，却取得了快速提升？

围绕这一问题，我的学生朱鸣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从体系变革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的主要理论贡献就是从体系变革的角度，以国家间相互战略保证和信任为主要变量解释了欧洲安全合作的内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既有的以共同盟友或共同威胁为主要变量解释国家间安全合作的理论。不仅如此，朱鸣还从体系进程和体系结构两个方面分析了体系变革对于国家间安全合作的影响，从而在理论上弥补了结构现实主义尤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将“结构选择”作为单一自变量和自由主义将“体系进程”作为单一自变量的不足。进而，通过分析 19 世纪欧洲协调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和冷战结束之后欧洲国家间安全合作的几次尝试，朱鸣博士的论文从实践上向我们展现了欧洲实现安全一体化的因果机制，并因此通过增添安全维度丰富了有关欧洲地区一体化的研究。因此，作为导师，我对本书的付梓尤感欣慰。

正如朱鸣在本书中所强调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真实路径首先是政治和安全合作，然后是经济合作与一体化，最后是构建一种共同身份与认同。然而，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对欧洲安全一体化的解释均颠倒了因果关系，因而与经验事实不符。前者以经济一体化来解释安全一体化，后者以共同身份与认同来解释安全一体化，但两者都忽视了国际安全制度本质上是权力政治的产物，在制度构建过程中，权力发挥着核心作用。虽然正确地指出权力在制度构建中的关键性作用，但结构现实主义对于欧洲安全一体化的解释也存在缺陷，因为它没有认识到国际政治是一个不断进化的体系，从而忽视了体系进程因素对国家行为的解释力。因此，传统的结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要么预测冷战后欧洲体系将回到 19 世纪的安全竞争和均

势政治,要么以制衡美国权力或威胁来解释冷战后的欧洲安全一体化。前者的谬误在于,它未能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体系已稳固地演化为一个“洛克世界”,因此不太可能“回到未来”。后者的错误在于,它没有认识到,冷战后欧盟安全支柱和共同防务的建立与发展所产生的效果,可能是一个有时能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国际行为体的出现,但很少有证据说明,对于美国的疑惧是冷战后欧洲安全一体化取得进展的原因。

在朱鸣看来,安全一体化就是国家间安全合作的制度化形式和手段。安全合作的制度化需要国家间(尤其是前敌国之间)一定程度的信任。信任越多,国家间的安全合作越广泛,安全一体化水平也就越高;信任越少,国家间的安全合作越有限,安全一体化水平也就越低。国家间的信任需要成功的相互战略保证。相互战略保证措施的发起需要基于体系变革提供的两个必要条件:1.体系进程变化使体系从一个安全稀缺的“霍布斯世界”稳固地演化为一个安全相对丰富的“洛克世界”。在“霍布斯世界”里,国家假定其他国家都是恶意的,追求进攻性战略是实现安全的最佳途径,因此“没有相互战略保证存在的空间”。在“洛克世界”里,追求防御性战略是实现安全的最佳途径,国家假定其他国家的意图是不确定的,因此才有兴趣了解他国的意图,建立信任,探索广泛合作的可能性。由于难以完全消除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前敌国)现有及未来意图的不确定性(毕竟意图可以改变),两个善意国家需要不间断的相互战略保证以维持一种合作关系。因此,信任与相互战略保证以及更广泛的合作是一个正反馈过程。2.体系结构变化产生的有利于国家发起相互战略保证的外部环境。体系结构等外部环境因素是国家行为的基础。由于发起相互战略保证通常要求一个国家迈出和解的第一步,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家越有安全感,就越有可能发起相互战略保证。显然,拥有共同的强大盟友能够促成相互战略保证,因为共同盟友可以对两个国家进行劝诱乃至施压,使它们形成更加合作的关系。两个国家面临共同的强大敌

人时也更有可能发起相互战略保证,因为有这样做的工具性需要。但体系结构等外部环境因素也是国家归因努力的基础。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相互战略保证或和解信号的发送国面临的外部制约因素大时,信号接收国会认为发送国合作姿态的成本和风险低,而可能的获利高,因而可信度低,所以信任是有限的;当信号发送国面临的外部制约因素小时,信号接收国会认为发送国合作姿态的成本和风险高,而可能的获利低,因而可信度高,所以信任是广泛的。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协调”机制的形成与失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共体/欧盟安全一体化的发生与发展都为朱鸣的理论假说提供了有力支持。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依然是一个安全稀缺的“霍布斯世界”,大国均假定彼此间的意图是扩张性的,因此几乎不存在相互战略保证与信任的空间。尽管1815年英、俄、奥、普、法五大国将暂时的“均势和平”固化为“欧洲协调”机制,但这种制度化的安全合作只是建立在相互防范与牵制而非互信的基础上,因而在和平的表象下孕育着大国间新的冲突与战争。随着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欧洲历史上大国间首次安全一体化的尝试失败了。

1945年之后,欧洲体系已稳固地演化为一个安全相对丰富的“洛克世界”。在“洛克世界”里,国家假定其他国家的意图不一定是扩张性的,因此有兴趣探知他国的意图,从而为相互战略保证与信任的建立留下了空间。与此同时,冷战时期欧洲体系的结构等外部环境也为法德发起相互战略保证创造了有利条件。当美国的军事保证和苏联的安全威胁同时存在时,西德与其欧洲伙伴国通过构建制度启动和解,积累信任,达成“浅和平”。在此之前,欧洲安全一体化通常会失败;在此之后,欧洲安全一体化才会取得进展。然而,体系结构等外部环境也是国家归因努力的基础。当美国的军事保证和苏联的安全威胁同时存在时,西德的和解姿态在法国等欧洲国家看来更多地是出于外部环境约束下的功利性算计,而非其本身的善意,因而可信度低。因为信任是有限的,所以冷战时期欧洲安全一体化水平也是有限的。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驻欧军事力量的大幅撤出以及德国的重新统一,欧洲体系逐渐演变为一个多极结构。为打消法国等欧洲国家对统一后德国的不安,在已有信任的基础上,法德作出新一轮相互战略保证。然而,当美国的军事保证明显下降和苏联的安全威胁消失时,德国的和解姿态在法国等欧洲国家看来更多地是出于其本身的善意,而非功利性的算计,因而可信度高。因为信任是广泛的,所以冷战后时期欧洲安全一体化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国家间关系也从“浅和平”走向“深和平”。

2016年英国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无疑是对欧洲一体化的一次严重打击。但英国决定脱欧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真正动摇欧盟以法德为核心的安全一体化体制。总之,朱鸣博士的论文从国家间相互战略保证和信任的角度诠释欧洲安全合作的内在机制,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展望欧洲一体化的未来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

潘忠岐

2017年2月20日

致 谢

对于这篇博士论文的完成,我需要感谢许多师长、朋友和家人。虽然无法一一列举,但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潘忠岐教授。潘老师为人谦和,治学严谨。在从论文开题到修改的整个过程中,潘老师不厌其烦地与我多次讨论,甚至是争论。从中我不仅在学业上受益匪浅,而且体会到一位学者应该具有的品质。

其次,我要隆重地感谢倪世雄教授和唐世平教授。自我上大学以来,倪老师作为学界泰斗不仅是我在国际关系理论上的启蒙老师,而且对我倍加关爱,每当我在学习和工作上遇到困难时,他总是能够给予我至关重要的鼓励与帮助。对此,我不胜感激。作为一位享誉国际学术界的国际政治学者,唐老师对于我的指点是至关重要的。承蒙唐老师的允许,我旁听了他的“研究设计”课程,从而弥补了自己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无知。在一次次聊天的过程中,唐老师还促使我对国际体系的社会演化加以思考。此外,我要向复旦国关学院资料室的陈友琴老师致以由衷的谢意,在我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每一个阶段,陈老师总是热情地给予我必要的帮助。

本论文的选题源于我2004—2006年作为解放日报驻欧盟记者在布鲁塞尔的工作期间的经历。在此,我要感谢在报社工作期间的领导陈振平总编辑。作为报界泰斗,陈老师不仅使我认识到新闻的价值,而且加深了我对国际事务的理解。此外,我还要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丁幸豪教授表达衷心的感谢。十多年来,丁老给予我的关心与鼓

励始终是我在人生道路上继续前行的动力之一。

我还要感谢论文指导小组中的几位老师。他们是朱明权教授、陈志敏教授、陈玉刚教授、苏长和教授与张建新教授。他们的批评与意见对于本论文的最终完成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此外，我要感谢我在复旦大学外事处工作期间的几位领导和同事，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恐怕无法得到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他们是朱畴文教授、信强教授和张家栋教授。我还要感谢我目前工作上的领导朱懂理副教授，正是她的理解与支持使我在写作上拥有了较为充裕的时间。

最后，我要表达对于家人的愧疚与感谢。由于工作和学习的双重压力，我在攻读学位期间无法经常看望年迈体病的父母。作为他们的独子，我深感愧疚，并感谢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当然，我必须感谢我的妻子张自然，没有她对我的忍耐与照料，这篇论文是无法得以顺利完成的。

朱鸣

2017年7月8日

目 录

序	1
致谢	1
第一章 导论	1
一、研究问题及其意义	1
二、既有理论解释及其不足	9
三、主要变量与理论路径	21
第二章 体系变革与安全合作	43
一、制度与合作	44
二、体系进程变化与安全合作	51
三、体系结构变化与安全合作	63
四、假设与推论	75
第三章 19 世纪“欧洲协调”与安全一体化的尝试	92
一、维也纳体系：未发生的变革	93
二、从“欧洲协调”到克里米亚战争	105
三、小结：对理论假设的检验	119

第四章 冷战时期欧洲安全一体化的缓慢进展	127
一、战后欧洲体系与相互战略保证	128
二、欧洲安全一体化的启动与挫折	138
三、欧洲政治合作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148
四、小结:对理论推论的检验	159
第五章 冷战后时期欧洲安全一体化的快速推进	171
一、德国重新统一后的欧洲体系	173
二、欧盟的共同外交与防务	183
三、英国脱欧、乌克兰危机与欧洲安全一体化	193
四、小结:对理论推论的检验	205
结论	215
参考文献	224

第一章 导 论

冷战结束以来,在遭受两次世界大战蹂躏和美苏冷战困扰的欧洲,作为地区一体化典范的欧盟逐渐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尽管欧盟国家之间已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安全竞争,但是它们之间安全合作^[1]乃至安全一体化的起源、进展与前景始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及其后续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以“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和“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为核心的欧盟“安全支柱”的确立^[2]。在1999年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欧盟正式决定建立一支6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从而使共同防务有了实质性的进展^[3]。此后,2003年欧盟出台了首份欧洲安全战略报告,2007年通过的《里斯本条约》产生了首位欧盟“总统”和“外长”,并提出了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借此,欧盟似乎正以一个全球行为体(a global actor)和“超级大国”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但是,关于欧盟国家间安全一体化的辩论远远没有停止。

一、研究问题及其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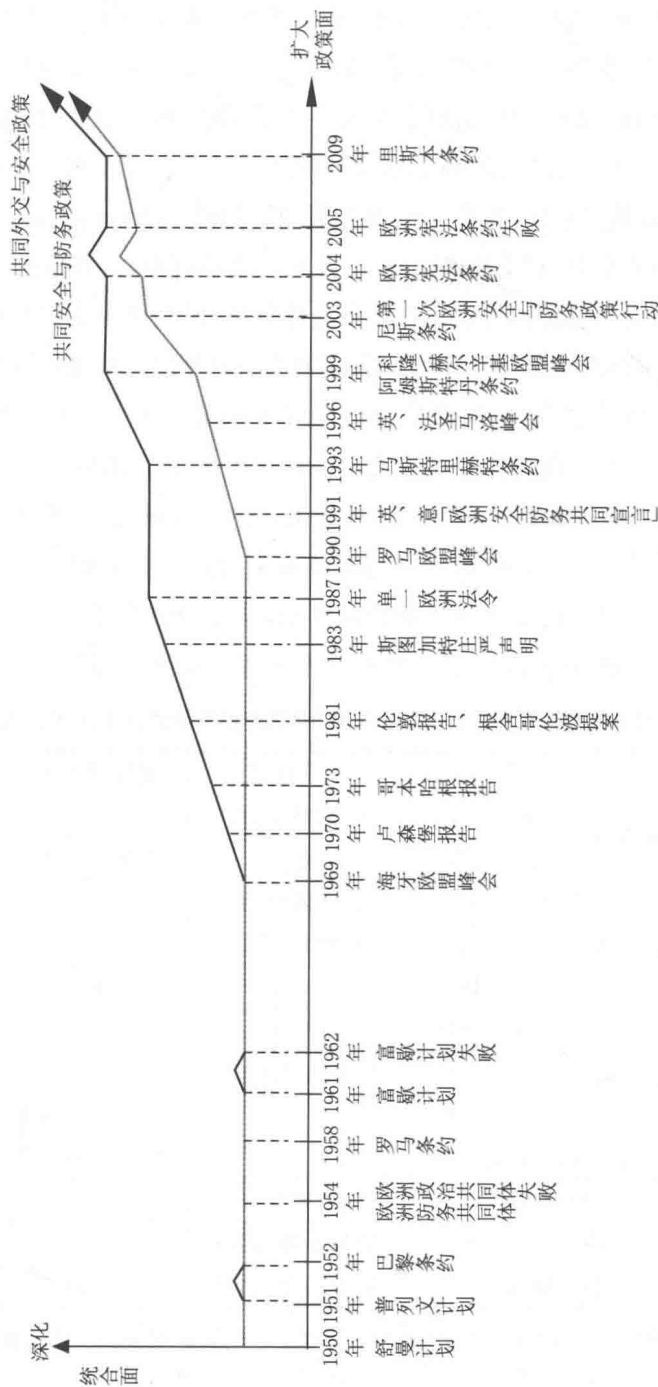
(一) 研究问题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欧洲安全一体化,即狭义上的欧洲政治一体化。^[4]简单地说,欧洲安全一体化就是“欧洲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

过程”，也就是指“欧洲政治合作”(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和“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CSDP)等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过程；其范围涉及外交、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性质上属于敏感的“高级政治”。因此，在欧洲一体化的整体发展过程中，安全一体化的速度远比“低级政治”的经济一体化缓慢，其主要原因在于外交、安全与防务主权的让渡较不容易。^[5]

然而，如果我们审视自 1648 年以来的欧洲国际体系，就会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首先，在 1945 年以前，这一体系始终被国家间的安全竞争与冲突所困扰。正如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说：“欧洲国家体系从一开始就为战争所困扰。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总会在欧洲大陆的某个地方存在着战争。19 世纪是具有较长时间的和平时期，但是也有几次大的战争和危机。例如，19 世纪的前半期爆发了持续和血腥的拿破仑战争，然后又发生了克里米亚战争、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战争。1914—1945 年间的战争继续了这种漫长的历史模式。它们仅仅在毁灭规模的巨大增加这一点上就代表了与以前几个世纪的事件的决裂。”^[6]然而，在 1945 年之后的欧共体/欧盟范围内，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的战争不仅在物质上不可能，在观念上也变得不可想象。今天，欧盟成员国以安全一体化形式表现出的制度化的安全合作不能不说是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

其次，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以来，虽然欧共体/欧盟国家持续地寻求安全合作，但是作为安全合作^[7]制度化形式的安全一体化水平却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演变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冷战的前半期，欧洲安全一体化进程频频受挫（例如，“欧洲防务共同体”、“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失败和“富歇计划”的流产）；在冷战的后半期，欧洲安全一体化进程才以“欧洲政治合作”机制的形式启动，并取得了重要但仅非常有限的进展；在冷战结束以后，欧洲安全一体化进程以“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支柱的建立为标志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与深化。这种阶段性特征可以用图 1.1^[8]直观地表示出来。



“—”：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过程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过程

资料来源：张福昌：《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发展与前瞻》，载《欧洲研究》2012年第3期。

图 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共体/欧盟安全一体化的演变

从图 1.1 可知,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安全一体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而言,直到 1969 年海牙峰会的召开,欧共体国家才开始在外交政策领域进行有效的合作与协调,从而启动了“欧洲政治合作”机制。1987 年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标志着冷战期间欧洲安全一体化水平达到最高点。在冷战结束后,随着 1993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生效,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支柱得以确立,并在冷战后时期,尤其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防务合作领域,欧共体国家只是在冷战前期进行了两次尝试(即“普利文计划”和“富歇计划”),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单一欧洲法令》也仅涉及“安全合作的政治与经济层面”,而没有涉及防务合作。直到冷战结束之初,在 1990 年召开的罗马峰会上,“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才被提出,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后,“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继续得到深化,2003 年第一次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行动得以实施,2009 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将“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升级为“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表 1.1 《里斯本条约》前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决策方式

			一致通过	特定多数表决
共同外交 与安全 政策	共同战略	内 容	V(欧盟峰会)	
		执行措施		V(欧盟理事会)
	联合行动	原则与方针	V(欧盟峰会)	
		内 容	V(欧盟理事会)	
		执行措施		V(欧盟理事会)
	共同立场	原则与方针	V(欧盟峰会)	
		内 容	V(欧盟理事会)	
		执行措施		V(欧盟理事会)
	任命特别代表			V(欧盟理事会)
欧洲安全 与防务 政策	原则与方针		V(欧盟峰会)	
	内 容		V(欧盟理事会)	
	执行措施		V(欧盟理事会)	

注:任命特别代表与所有“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执行措施皆采用特定多数表决。
资料来源:张福昌:《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发展与前瞻》,载《欧洲研究》2012 年第 3 期。